

符山堂刻本《音学五书》版本问题考释

张 民 权

一、符山堂本《五书》版本特点及其差异

符山堂本《音学五书》(下简称《五书》),由当时著名刻书家张弢校刻。顾衍生《元谱》:“(康熙六年)开雕《音学五书》于淮上,张力臣弢父子任校写之役。”^①

符山堂刻本是传世《五书》中最早的刊本,其余本子都是它的翻印本,如光绪十一年四明观稼楼仿刻本(今中华书局据此影印),光绪十一年湘阴郭氏(庆藩)岵瞻堂刊刻本,光绪十六年长沙思贤讲舍刻本,等等。“符山堂”盖张弢书室之名,其校刻之书镂刻精美,校讎精细,堪称清代板刻书中的精品。今传符山堂本《五书》,其版心高约二十厘米,半叶宽约十三厘米。扉页上一般有“符山堂藏板”字样(后来印刷的书则没有)。“姓氏”一叶列有顾氏外甥徐元文、徐乾学、徐秉义三兄弟“参阅”及张力臣、张叶增、张叶箕父子三人“校订”和“同书”字样;有刻工人姓名,曰“旌德周希享瑾刻”(“享”“瑾”双行小字排列)。书中“校”字缺笔,避明熹宗朱由校讳,这是辨别《五书》是否符山堂本的一个重要依据。如《音论》卷上:“《玉海》曰:景德四年戊寅,崇文院上校定《切韵》五卷。”“校”字缺捺笔。无论何种册数装订本均如此。“校”字避讳,一是为了说明《五书》著述远在明末,二是可以避清廷文字狱以防不测。此顾炎武隐衷所在。

今传符山堂本《五书》很多,有的因原书残缺或扉页上未注明“符山堂藏板”字样者,人们不明其版本由来,则笼统称之为“清刻本”。而对勘版式文字等内容,实际上仍为符山堂本。只是在版本装帧上不同而已。笔者曾走访上海、南京、北京等地图书馆,所见符山堂本《五书》不下二十种,发现它们在版本装帧上却多有差异。其差异主要表现在:

1、《五书》的册数不一样,或十六册装订,或十二册、十册、八册装订,且纸型大小有异;

2、书中顾氏三篇序言(下称自序、后序一、后序二)及所附《答李子德书》的次序位置不一样,或在书前,或在书后;

3、徐家三兄弟(乾学、元文、秉义)曾写过一篇《征书启》(见文末附录),为其舅父之书堂广征天下遗书,而在各种符山堂本《五书》中或有或无;

4、有的本子扉页上并未标明“符山堂藏板”版权字样。

均为同一个人校刻的本子,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差异?其原因又是什么?第1点差异可以解释为前后印刷的时间不一,因而有装订上的差异。然而第2点和第3点却不是这么简单。因为序文的次序安排,著述者一定有所交代,作为顾炎武的好友张弼也不会轻易改变朋友初衷。而徐家三兄弟又都曾是清廷高官,因此,《征书启》的有无,决不可随意所为。而版权字的标注更不是随意可无的事情。可以肯定,这些版本装帧上的差异,必有其原因所在。下面,就相关问题作些考释,以请正于方家。

二、《五书》的著述及刊刻经过

笔者认为,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楚,就必须把校勘者张弼校刻《五书》的前后经过及其版本的流传情况考察清楚。先考察《五书》的著述及刊刻经过。

作于康熙十九年(1680)的《音学五书后序》言曰:“予纂辑此书

几三十年,所过山川亭障,无日不以自随。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。然久客荒壤,于古人之书多所未见。日西方莫,遂以付之梓人。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。又得张君弼为之考《说文》、参群书、增辩正、酌时宜而手书之,二子叶增、叶箕分书小字,鸠工淮上,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,必归于是。著书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。”^②《五书》的著述及刻写过程大致如此。

《五书》初名《音统》,刊刻后改名为《音学五书》,陈上年《别本干禄字书序》可证。^③《五书》初撰于明末,其中《诗本音》著述较早,今《五书》前有曹学佺崇祯十六年(1643)序可证。^④以后不断修改,最后完稿于康熙六年(1667)并开雕于淮上。然而《五书》卷帙浩繁,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镌刻完毕。其后顾炎武又反复修改,故刊刻工作断断续续,直到顾炎武卒年(康熙二十一年)仍未全部刊出(见下详考)。而今日各地图书馆所藏符山堂本标注“康熙六年”者,是以初刻年代言之。

《五书》问世,张弼之功不可没。张弼(1625—1694)字力臣,号亟斋,江苏淮安山阳人。颇有志节,明亡,弃诸生而不仕。一生清贫,以卖书画和刻书为业。平生究心金石文字之学,有《昭陵六骏赞辨》、《瘞鹤铭辨》等文传世。顾炎武尝言:“精心六书,信而好古,吾不如张力臣。”^⑤又赋诗赞曰:“张君二徐流,篆分特精妙”,“尤工《苍》《雅》学,深鄙庸儒剽”。^⑥“二徐”为徐铉、徐锴兄弟,南唐时以治《说文》名家。后二句指力臣精深于文字训诂之学,为防“庸儒剽”而精心校写《五书》事,即顾炎武与友人书言“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”。其生平事迹可参见李元度《国朝先正事略》及有关方志等。

《五书》自康熙六年开雕,至十年(1671)时尚在刊刻中,此年顾炎武与张弼诗可证:“遥忆张平子,灯下正勘书。”^⑦康熙十二年以后大致完毕。是年炎武为当局所请,寓居山东德州修订州志,此间与友人书札中曾提到《五书》刊刻事。《蒋山佣残稿》卷二《答叶嵎初》:“然为《音学五书》将成之际,早夜无一间晷。”^⑧可见《五书》正在刊

刻完成中。此年徐家兄弟作《征书启》，与五书刻毕或有联系。笔者见南京图书馆所藏《音论》残本(编号为24932)，书前仅有曹学佺序、著者自序和《征书启》的，可能是最早的符山堂本。因为此书纸色发黑，特别陈旧，与他本迥异。盖当时有少量刻本在朋友中流传。

五书刻成，炎武厚自宝祕，作后序曰：“刻成藏版名山，以待后之信古者。”并坚信自己“一生所著之书，颇有足以启后王而垂来学者”^⑨。言曰：“若《音学五书》，为一生之独得，亦足羽翼六经”，故倍加珍重，“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”^⑩。

《五书》刻成之后又有若干修改。而五书中《唐韵正》最为浩博，刊刻难度也非常大。阎若璩所言“宁人书亦非呕数升血读之不可”者^⑪，即指此书而言。此书论证材料极为丰富，为证明某字古音，音证材料多者往往数百条。在这些传世的历史文献中，难免会有文字上的传抄讹误等。张弼认真校对，刊正讹误，顾炎武与潘耒书曰：“即如近日力臣札来，《五书》改正约有一二百处。”^⑫这样《五书》不得不经常改刻，以至“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”。

而修改工作一直持续到康熙十九年(1680)，此年春有手札云：“近来刊落枝叶，不作诗文。……而《音学五书》之刻，其功在于注《毛诗》与《周易》，今但以为诗家不朽之书则未矣。刊改未定，作一书与力臣，先印《诗经》并《广韵》奉送，有便人可往取之。但《诗经》中尚须改刻七纸，才于正月发去，稍迟取之则全矣。《易音》亦可得，其《音论》、《唐韵正》、《古音表》三书再待一年以后竟。以尊札与力臣相通为便。”^⑬

于是作《五书》后序二，意味着修改工作已基本结束，但仍有少数地方未能改定。《残稿》卷三《与汤圣弘》：“拙著《音统》已改名《音学五书》，以鬻产之资，付力臣兄刻之淮上，尚须改定，故未印出，先以序目请正。内《诗本音》已毕工，又有《下学指南》一帙，便中索之清江，即可得也。”文中“序目”者即指《五书》后序等内容。^⑭

时顾炎武身在陕西、山西等地，又年事已高，行动多有不便，《五

书》修改只能通过信件来往。而其中“尚须改定”者可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,因此,顾炎武希望能够亲临淮上与力臣当面改定。然而路途遥远,资斧短缺,难从心愿。此年冬天,顾炎武寓居太原阎若璩父宅,写信求助于他的两个外甥,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,好于明年春启程。^⑤第二年与王宏撰手札云:“弟以淮上刻书未竟,须与力臣面相考订。……此去计须半载,然闻中州、淮甸,在在饥荒,未卜前途何似?”^⑥由于路途遥远,年老体弱(时年六十九岁),淮上之行未果,第二年病逝于山西曲沃。而五书修改,终成绝笔!

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说明《五书》在顾氏身后未能刊出,张穆《阎潜丘先生年谱》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条下记曰:“《陆清献日记》:癸亥十一月十日,淮安阎百诗来会,言顾宁人已不在,所著《音学五书》方在刊刻。”又徐乾学《憺园集》卷七《碧山集》有《题张力臣小像七绝二首》,其中“洒泪风前诵渭阳”句下注曰:“力臣方为舅氏亭林校刻《音学五书》。”笔者考证,张弢进京画像事是在康熙二十六年(1687)前后。此年力臣六十三岁,王士禛《题门人张力臣写真二首》诗亦可旁证。^⑦

三、《五书》刻板的流传问题

当时有传言炎武死后,张弢将《五书》刻板卖于李光地者。张谱卷四《亭林书目》中有一段注文,曰:“衍生云:《五书》刻于淮上,后为张力臣鬻于安溪李公。”以张氏与顾炎武交情看,张弢家贫恐怕还不至于如此。故张穆有疑,案曰:“潘稼堂有《访顾亭林遗书不得诗》序言:《音学五书》刻于淮浦张力臣家。力臣亡,其子以板质于人,不可复问。则以为力臣鬻之者,诬也。”《山阳志》言:“《五书》板存淮上,李相国光地以五百金购去。……后嗣衰微,其符山堂藏书多归于何焯。”^⑧可见张家衰微,不独《五书》板刻流亡矣!

然而,县志所言《五书》板刻流亡问题并不确核。今案之李清植《文贞公年谱》所记,《五书》原板流落扬州坊间,是李光地以五百金

赎回。时在康熙四十六年(1707),“坊贾将削其版以镌他文,适有见者,以告公。公为赎归,传于世。”(《年谱》卷下)

李光地福建安溪人,康熙九年进士,官至文渊阁大学士,故有相国之称。李氏在音韵学方面受知于顾炎武,^⑨先后著有《等韵便览》和《榕村韵书》等。正是出于对顾炎武古音学的推崇,李氏才不惜重金赎回《五书》原板。

可见《五书》自刻成之后,至少经历了张弢、扬州坊间和李光地三家不同时间的多次印刷出版,而所有版本装帧上的差异包括“符山堂藏板”版权字号的有无,均由此而来。其中徐家衰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
据《清史稿》等文献资料,徐家三兄弟皆学有所成,先后考取进士,时号“昆山三徐”。兄乾学(1631—1694),康熙九年进士。充《明史》总裁官,累迁侍讲学士,官至刑部尚书。弟秉义(1633—1711),康熙十二年进士,官礼部侍郎、内阁学士等。次弟元文(1634—1691),早在顺治十六年就考取进士,曾充翰林院掌院学士,擢左都御史,官拜文华殿大学士。康熙二十七年(1688),徐乾学因张汧贪黷案牵连被劾,第二年又被副都御史许三礼劾,说他与少詹事高士奇结纳营私,徇庇子侄,不得已乞假回籍。二十九年春,又遭两江总督傅拉塔疏劾,所谓纵容子侄招权竟利,明年又因潍县朱敦厚案而夺职。疏劾连及元文,于是兄弟二人并休致回籍。元文于回籍第二年病逝。乾学于三十三年七月病逝。秉义此间亦“乞假归”,至乾学卒而召补原官。三十八年任詹事,次年转礼部侍郎。四十三年休致回籍,五十年卒。

如此看来,《征书启》被撤与徐家衰落有着必然的联系。世态炎凉,人情本来如此。而今日看来,《征书启》实与《五书》内容无涉,删之无伤大雅。当时顾炎武附之于《五书》前,无非是借重徐家兄弟在清廷的地位而已。所幸的是,《五书》原板没有毁于扬州书贾,否则,亭林数十年之孤忠,张弢数十年之心血,乃至清代古音学之建立,

都将毁于一旦!

附录:徐氏兄弟《征书启》原文及考证文字

舅氏顾宁人先生年逾六十,笃志五经,欲作书堂于西河之介山,聚天下之书藏之,以贻后人之学者。昔李公择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,藏书九千余卷,名曰李氏山房。江自任以官守之暇筑阁于麻姑山,购经史诸书藏之。李惟寅、邓本受二道士寔共成其事。此二贤者或寓诸兰若之居,或佐以黄冠之力,岂若郑公礼堂、刘瓛学舍,而又不为一家之蓄,俟诸三代之英者乎?伏惟先达名公,好文君子,如有前代刻板善本及抄本经史有用之书,或送之堂中,或借来录副,庶传习有资,故典不坠,不胜冀幸之至。

按,《征书启》大致作于康熙十二年。据《元谱》,此年四月顾炎武来山东德州,为当局所请,参与订州志之事。《残稿》卷二《答叶嗣初》有言:“才入署中,未便外出。年兄至此而不得一晤,真交臂失之矣。山右诸公将为弟筑堂于西河,期以秋杪往莅其事,以故亟来历下。……贵治有旧家卖书者否?如有千百卷之书,可佐名山之藏者,则当携贄以来矣。舍甥《征启》一通附览。”此书信据人事内容作于十二年。可知徐家兄弟《征书启》亦作于此年或之前。叶嗣初为顾炎武当年仇人,顾炎武北游即为其所逼,此时叶氏官山东济宁道僉事,故言及修志事及“贵治有旧家卖书者否”云云。此时二人或有和好之意。又按,笔者曾撰《李光地与〈音学五书〉》一文(《南京社会科学》1996年第8期),以为《征书启》作于康熙十六年前后,今天看来似为不妥。

注:

① 转引自张穆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。下引《元谱》者均出于此。

② 录自《音学五书》。文字上与《亭林文集》卷二所载略有异同。

③ 其曰:“若夫述三代之遗,复《风》《骚》之正,则有宁人《音统》在,将次第公诸海内焉。”按,此序作于康熙五年。

④ 王国维以为曹序为顾炎武假托,不可信(参见《观堂别集》卷三《音学五书跋》)。本文不取。

⑤ 《亭林文集》卷六《广师篇》,第134页。中华书局标点本《顾亭林诗文集》,1983年5月第2版。下同。

⑥ 《亭林诗集》卷五《赠张力臣》。第419页。按此诗作于康熙十八年。

⑦ 《寄张文学弼时淮上有筑堤之役》,《亭林诗集》卷四,第385页。

⑧ 按,顾炎武《蒋山佣残稿》,潘耒刻《亭林文集》不载。今辑收于《顾亭林诗文集》中。

⑨ 《亭林文集》卷三《答曾庭闻书》,第66页。又见《蒋山佣残稿》卷二。

⑩ 以上引文并见《亭林文集》卷六《与杨雪臣》,第139页。

⑪ 《潜丘劄记》卷五《又与石企斋书》,页六十二。四库全书本。

⑫ 《亭林文集》卷四《与潘次耕书》。第76页。

⑬ 《蒋山佣残稿》卷二《与施愚山书》。第59页。考书信中所言人事,此书信作于康熙十九年。

⑭ 此年之后《五书》当有少量印刷。这里面一个重要的佐证就是毛奇龄在《古今通韵》和《易韵》中所提到的,毛奇龄在史馆修纂《明史》期间,与李因笃等人多次就《诗本音》问题进行争论。而毛李二人均于康熙十八年之后应征博学宏词而入史馆。毛奇龄《古今通韵》完刻于康熙二十三年。

⑮ 其曰:“淮上勘书出书,复得一两月。而夏暑秋潦冬寒,并不利于行路,则必以春去而以春回,首尾一年,费当何若?吾自甲寅以后,坐食六年,每年约一百二三十金。兼以刻书之役,千墩来物已尽用之。”(《残稿》卷三《与原一公肃两甥》。第214页。)

⑯ 《残稿》卷三《留书与山史》,第212页。据诸家年谱所记亭林行踪推考,此书信作于康熙二十年。

⑰ 参见拙文《一代儒宗同所向,邛须金石正皇初——清代金石文字学家张弼事略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1998年第5期。

⑱ 金秉祚《乾隆山阳县志》卷三十三《人物志》,页一。清刻本。

⑲ 参见李光地《顾宁人小传》,《榕村全集》卷三十三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北京广播学院文学院